

[ 学术论坛 ]

# 机遇与挑战

——世界新格局建构下的中国制度建设

徐海燕

**摘 要：**金融危机是一场严重的全球危机、信仰危机和帝国主义危机。世界格局重构初见端倪：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左翼运动的复兴、世界各国对国际新秩序进行探索、马克思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在应对危机时的表现成为关注中的热点，只有增强社会主义政府的调节能力，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成为增加社会主义凝聚力，才能长期坚守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国际共运做出贡献。

**关键词：**经济危机 世界格局 中国挑战

## 一、经济危机正在演变为全球性的世界危机

2007年8月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是当今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场危机已经从美国波及到全世界，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此次危机不仅让美国金融体系的根基面临崩塌的危险，世界经济也因此遭遇极度的重创。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性结构矛盾，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弊端，它既是一场严重的全球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信仰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危机。

### 1. 经济危机加剧了全球结构性矛盾

这次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自金融领域爆发、集中于金融领域，对金融体系的破坏性最大，但又不限于金融领域，由金融向非金融领域蔓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蔓延，由技术操作层面向理念、模式、体制层面再向制度层面蔓延，这场危机渗透、影响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方面。

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首先改变了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转换了剥削手法，借助金融创新，垄断金融市场，操控全球经济；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和优势地位，在全球化进程中展开世界规模的巧取豪夺，把他国的财富通过金融创新转移到自己手中，从而维持自己的繁荣。发展中国家获利很少，有的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原有的体制、政府领导能力、社会设施、政策体系和价值观念和文化面临着全球化

作者：徐海燕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的冲击。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同时,有效地全球性经济协调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这不但使整个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也使全球爆发经济危机的风险不断增大。

其次,在全球化进程中,以欧美领衔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呈愈来愈高的趋势。虽然生产出的商品呈几何数字增长,但国内消费越显乏力,导致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展。金融危机中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将国内过剩的资本输出,以便在国外谋求高额利润。第二,将非核心技术转移到国外,以取得在别国的垄断优势,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第三,争夺商品销售市场,确保原材料和能源的可靠来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化的趋势下,国外投资越来越少地用于建设新的生产设施、服务企业和贸易企业,而是用于收购和参股现有企业。这些经济上的动因与欧美国家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外交上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不断遭到美欧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困扰,频频遭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在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名目下被征收惩罚性保护关税。不仅如此,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竞争力下降,它们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争夺更加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手段。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代价以及环境污染、能源和资源消耗的代价,特别是在现代技术方面愈发陷入对外依赖的境地,这使全球性结构危机进一步加剧。

## 2. 经济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

首先,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悬殊加剧、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问题突出等严峻事实,使民众信任危机从金融体系延伸至政治体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一项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危机爆发以来,认为“国家在进步”的美国人数不断下跌,只有不足15%的人认为美国正在向“正确方向前进”。<sup>①</sup>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暂时摒弃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采取了各种凯恩斯主义救市措施,但成功被救助的是金融垄断资本,而被主权债务套牢的却是广大的劳动者,大多数人同时忍受高失业率和降低的社会福利保障,而金融家和各种垄断寡头却享受高额的年终分红和极低的税率。如今,不仅是“贪婪的”银行家,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性正在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如果在前期他们只是通过意愿来表达不满,但自2011年9月17日开始,美国民众开始举行更为有力的行动——由不同政治派别、不同肤色、不同性别者参加的目标明确的“占领华尔街”政治抵抗运动。

其次,失业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深不可测的黑洞,成为威胁欧美国家稳定的“火药桶”。自由资本主义药方下,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地减少,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它并不是社会生产发展绝对不需要的,而是他们不为资本增值所需要,使他们成为“过剩”的或“多余”的人。在此次危机中,失业形成了三种形式:一是流动的过剩人口,二是潜伏的过剩人口,三是停滞的过剩人口。庞大的社会人口的存在,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

欧盟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欧盟就业与社会状况报告》指出:欧盟27国2011年第四季度的平均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到9.8%,其中青年群体失业情况最为严重。该报告以11月为例指出,欧盟青年当月失业人口共计560万,青年平均失业率达到22.3%,比2008年春上升了约7%,西班牙等国青年的失业率更接近50%。<sup>②</sup>从前,多数欧美公民都崇尚个人奋斗,相信自己有成功的机遇,自己的下一代可以通过勤奋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现在,严峻的失业形式使

①彭梦瑶:《经济低迷 美国人焦虑》,新华网,2008年10月22日。

②李永群:《青年失业欧洲的结构难题》,《人民日报》2012年1月31日。

许多民众清醒，按照现行的“游戏规则”，他们可能无法改变这一差距。实现西方世界的“中产梦”机会遥遥无期，欧美社会这种失望和愤懑的情绪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火药库。

### 3. 经济危机是帝国主义的危机

实际上，就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来说，没有一个是靠民主制度发达起来的，从历史上来看，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主要采取直接的掠夺与渗透，如暴力抢夺、移民、占有等方式，通过硬实力进行远距离和局部攻击以达到对国外领土的持续控制，靠剥削本国和他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用剥夺和战争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用劳动人民的汗水和鲜血筑起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国度”。

当然，几百年过去了，资本明火执仗的剥削和掠夺方式已难以为继，新时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始采用间接手段，以“软实力”的形式，通过政治独立和资本收买来控制当地政府机构与社会精英，进行新殖民统治与剥削。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以“软实力”为手段对苏东进行和平演变。苏联东欧剧变给这些国家摆脱危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由于这些国家在演变后向西方资本主义施行全方位的开放，从而使西方国家能够将经济危机的后果无保留地转嫁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身上。

新世纪，“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市场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①</sup>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债券市场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基金市场迅速成长，最后，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发，美国、欧洲与亚洲三大区域的外汇市场已经连为一体，其运作方式、交易品种与基本手段保持一致。但美国主导下，金融市场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逻辑，脱离实际经济逻辑，使全球的动荡继续加剧，沉溺于谋求增长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即将破裂，不论是弥漫于西方世界的抗议活动、债务危机，还是地球的超负荷运转、气候异常，都已成为阻碍经济下一步增长的拦路虎。上述表明，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危机四伏，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世界各国“共赢”、经济平等、政治公平、文化共存的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思考的话题，这种思考必将孕育世界历史的转折和重生。

## 二、金融危机下世界格局的调整

世界并没有因为美国“一超”主导而变得更加稳定、繁荣地向前发展。世界贫富的地区差距、国家差距、民族差距和阶级差距反而变得更大，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引发全球动荡。

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往往酝酿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是如此。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几乎所有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促进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加速了欧盟和欧元的诞生。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亚洲经济体“雁行模式”的区域分工结构，促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此次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危机同样为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世界经济就此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被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但经济危机动摇了世界对资本主义的信心，更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政治和体制的深层反思。西方左翼政党及其学者对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俄共党首久加诺夫在《全球化与人类的命运》一书中指出，全球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资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本、工业资本最终都是通过金融资本来进行奴役和投机的,这样的金融资本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再生产,而且它越过了商品生产的阶段。<sup>①</sup>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题为《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了吗?》中更提出了当今世界的四种“变革性力量”。第一是美元持续衰落,占国际外汇储备的比例已从85%降到60%左右。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仅有三种储备货币的时代: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第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第三是亚洲的崛起,意味着西方500年把持权力的终结。第四是联合国的衰落。2012年3月28日至29日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就是肯尼迪提到的最重要的变革性力量之一的变化:罗塞夫、梅德韦杰夫、胡锦涛、祖玛和辛格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这五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的体现,也是针对美国和欧盟放松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做出的反应。<sup>②</sup>

危机呼唤着变革。美国前副国务卿伯恩斯也不得不承认,后危机时代的人们“正处在一个时代变更期”,“这场危机在给世界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世界新秩序带来了一丝曙光。”<sup>③</sup>俄罗斯学者主张国际社会进行改革,以摆脱资本主义体制性的危机。认为“应该在老废墟上建立新的全球管理体系。”<sup>④</sup>德国学者呼吁建设一个低碳而且能源有效利用的全球经济,避免地球系统的危险变化,而建立在盲目增长、化石燃料和短期投资收益和基础上的,主导全球的商业模式只会破坏这一星球。<sup>⑤</sup>

发展中国家精英对此有更为独到的见解。南非总统祖马指出:“金融危机给全世界上了重要一课,那就是我们需要改革全球金融体系。”<sup>⑥</sup>刚果(布)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呼吁尽快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重建,使之更加公平并具有广泛代表性<sup>⑦</sup>。实际上,世界格局已经迈开了经济格局重构的步伐。

1. 世界经济国际格局重构初见端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是影响经济格局重构的主要因素之一。过去20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一直高于发达国家,使得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经济危机后,一直被划为发达国家的日美欧各国饱尝债台高筑和财政危机之苦,新兴国家则面临各种国内矛盾,同时维持高增长。在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中国2005年超过日本,位居第二。2009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都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过渡,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1%、5.3%、6.5%、3.7%和1.4%,分别为世界排名的第4、24、13、51、97位。<sup>⑧</sup>2012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6%,而七国集团仅为9%。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27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500亿美元,而且这些国家在中东和北非局势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明显趋于一致。<sup>⑨</sup>据预测,

①[俄罗斯]久加诺夫著,何宏江等译:《全球化与人类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

②[西]西韦奇:《金砖国家构建国际新秩序》,《参考消息》2012年4月10日。

③《后危机时代:新方法 新道路 新格局》,www.sina.com.2009年2月9日。

④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全球危机:创建的时机》,《俄罗斯报》2008年10月15日。

⑤[德]德克·梅斯勒:《从全球金融危机之中汲取的四大教训——从欧洲的角度审视全球大变革》,《中国金融》2009年第10期。

⑥转引自李鹏:《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新浪网,2009年6月1日。

⑦转引自王湘江等:《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在联大发言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新华网,2006年9月26日。

⑧陈硕颖:《2010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动态》,《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11—2012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⑨[西]西韦奇:《金砖国家构建国际新秩序》,《参考消息》2012年4月10日。

到2013年,印度将超过日本排名第三,俄罗斯将赶上英国居第六,巴西将力压法国占据第八。<sup>①</sup>

当前,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明显提升,对全球经济的话语权也明显提升。G20已经代替传统的G8成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G20框架下,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2010年4月下旬,世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后者投票权上升了3.13个百分点,至47.19%)。<sup>②</sup>IMF11月也通过决议,2012年将份额向发展中国家转移6个百分点,将欧盟国家在执行董事会中的8个席位让出两个给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将对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2. 社会主义思潮和左翼运动复兴。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还对世界左翼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世界格局的大变革趋势下,拉美地区的左翼、中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特别是在2006年大选后,以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巴西卢拉为代表的拉美左翼、中左翼政党或社会运动组织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国家上升为9个。他们在自身政策的调整中主张保持自己国家的特性,根据本党的实际进行了理论革新和政策调整,走自己的路,成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热点和亮点。

如今,拉美左翼政党正积极探索危机的出路,提出了新的建设性的主张。在执政理念上,巴西劳工党提出了“劳工社会主义”,查韦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提出“社群社会主义”,这些执政党正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发展模式,对曾长期主导拉美地区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深刻反思,是反对拉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过程中的一种新社会运动。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强化国际的作用,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更加注重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分化,这些主张引起了全球国际舆论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欧洲左翼运动的复兴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几十年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欧洲国家建立并实施了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者的安全和保障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然而,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虽然发生了分化,资本与新型的劳工阶层之间的支配与反支配、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依然在进行。社会福利制度缓和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矛盾,但是并没有改变导致财阀占有、两极分化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社会最富有的阶层与最贫困的阶层之间在财产占有上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2010年上半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经济危机的中心从美国转引到欧洲。不仅是希腊,整个德国有超过50个城市出现规模大小不等的游行;在德国法兰克福、柏林的抗议者在欧洲央行门前,或在总理府门前打着标语,喊着口号,进行示威;英国公共部门也举行规模巨大的罢工。

3. 世界各国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自上个世纪末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无不弹冠相庆,洋洋得意地将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历史的终结,宣告“美国治理下的和平”,以及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来临。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行其道。但令西方世界没有想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却在金融危机后被拉下神坛: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孕育着国内的动荡,世界各国开始纷纷反思,探索建构世界新的国际秩序。

首先,美国霸权与美元的衰落。与二战后在国际体系所确立的美国和美元地位相比,此次金融危机后,全球一些国家“用真金白银换取绿钞”的怪象已经不再。与此相反,去美元化、

<sup>①</sup>沈田贤治:《世界迎来“两超多强”时代》,《参考消息》2012年3月2日。

<sup>②</sup>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新华网,2010年4月26日。

去美国化已经成为了潮流。目前,世界使用美元结算的国家正在减少,美元开始衰落。

其次,西方价值观念的失灵引发西方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普通民众开始认清,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所推出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和债券归根到底是满足少数人的私欲。资本在不断扩张中表现出贪婪性和疯狂性,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正在逐渐提升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以非资本主义模式的探索已经开始。

其实,不仅是普通民众,西方精英自身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其中,在瑞士召开的第42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为典型。西方多个国家政要、专家学者和经济界人士认为,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病和危害;资本主义导致世界经济面临重大风险,改造现代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是全球性问题。但是,在达沃斯论坛上,虽然资本主义大辩论吸引了诸多舆论的目光,但在辩论中,政界、经济界人士并没有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而是商讨如何改良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

4. 马克思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金融危机把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西方世界却并未能有某个包治百病的新模式脱颖而出。重提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一种自然现象。例如,在希腊危机爆发前,西方所宣扬的文化和价值观是不少年轻人所追捧的。但如今,一切都发生改变后,埃及青年人在文化取舍上又陷入了茫然之中。<sup>①</sup>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可能将提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并且“在任一地区可能出现下一个马克思。”<sup>②</sup>显然,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危机至今是令人信服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从商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抽象而普遍的规定作为逻辑起点,对社会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现象——商品和商品交换加以分析而开始的。商品的价值形态由一般等价物(比如黄金),逐步发展成为货币。在货币流通过程中,纸币、符号等商品一般等价物,与货币代表的价值分离了,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也分离了。这种分离孕育社会的一切矛盾,也是发生危机的萌芽。马克思把商品转换成货币,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并预言,“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sup>③</sup>

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规模日益集中,使资本主义现代信用体制大行其道。它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发展成为纯粹的最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另一方面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形成赊购赊销,形成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现代信用体制大行其道,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言:“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sup>④</sup>

随着生产贸易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全球化加速了经济的膨胀。使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sup>⑤</sup>并最终导致危机。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完全从属于资本收益。马克思的学说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危机的直接原因。

①黄培昭:《后动荡时期埃及青年文化饥渴》,《人民日报》2012年1月11日。

②李雪:《美刊盘点10年国际赢家输家:金砖四国拉登获胜》,环球网,2009年12月31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④[德]卡尔·马克思著,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页。

⑤[德]卡尔·马克思著,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9页。

### 三、应对危机中的中国制度特色

#### 1. 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表现

为超越美国“一超”主导的世界发展的不良模式，全球各国展开积极合作，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相互交流探讨的成功经验，特别是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关注中的热点。

虽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等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重重阻力。特别是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从2009年至2011年连续3年均呈下滑趋势。而商品和服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为负，2012依然可能是负数。在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已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显现出放缓趋势，GDP增长速度从去年第一季度的9.7%下降到第四季度的8.9%。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向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7.5%。这一目标低于2011年GDP增长速度1.7个百分点，也是自2005年来GDP预期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sup>①</sup>

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依然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目前，中国是世界经济总量位居前列的国家，而且是IMF为数不多的债权国之一，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是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保持着10%以上的速度。2008年、2009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变为负数时，中国仍保持9%的GDP增长率。“胜出必有所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制度在避免经济危机时的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经济地位的承认和尊重。

#### 2. 治理危机的中国制度经验

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坚守主权意识，不照搬欧美自由经济模式。在发展市场化私有化的同时，保持了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国有份额；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对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倾注更多的政府关注。这些实践为推进世界文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在应对危机时候迅速反应进行调控。与各国政府积极联手，参与国际社会救市合作；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试行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在国内能及时调度各级力量进行大规模的计划调控，出手快、出拳重，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这表明，中国处理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第三，综合国力的提高增强了抗震力。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而言，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大大提高；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安全网络已经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有了质的区别；与经济萧条的时期相比，经济持续增长为中国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日美欧等各国在饱受债务高筑、财务危机以及各种国内矛盾尖锐化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却维持着一定速度，即使中国不免卷入经济危机，对人们生存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对于目前政治制度的框架，人民是认同、支持的。危机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sup>①</sup>陈叶军：《GDP下调增长目标为7.5%的原因与意义》，人民网，2012年3月13日。

### 3. 治理危机中的中国挑战

不可否认, 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也面临着经济结构性矛盾、规范分配方式、失业严重等社会问题。

首先是如何克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性矛盾。随着 GDP 的增长, 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 1000 美元大关, 标志着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始于起点很低的经济活动和收入水平。大批从乡村涌入城市的打工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在早期使生产力激增, 从而提高收入和投资水平。

现在, 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将需要“中等收入的增长”。<sup>①</sup> 在这一阶段, 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 汽车进入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 带动的将是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等高成本产业群, 正在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这是当前乃至今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可靠的支撑。

新阶段的消费结构和产业升级, 使城市对于农村的依赖程度大大减低, 城市居民主要消费品将是住房、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 电器、医疗、子女的教育等, 这就说明, “城里人的这些支出, 很难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sup>②</sup> 农村与城市的结构性差距进一步加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营私有经济的增长大大超过国有、公有经济。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公降私升, 市场化大潮中“拥抱资本, 疏远劳动”的风气兴起, 宪法中规定的按劳分配为主, 事实上被按资本分配为主代替。因此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 而资本所得占比不断上升。由于劳动者报酬在居民收入中占最大份额, 劳动者报酬在 GDP 中占比的下降, 就决定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GNP 中占比的下降。这种经济结构矛盾应引起高度的重视。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凸显: 即依赖国家投资生存的居民越来越多, 而新劳动力却日趋减少。例如, 在众多领域, 工资开始水涨船高, 但另一表现是地区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主要集中在建筑行。<sup>③</sup>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挑战。当前, 中国劳动力与老年人的比例还是 5:1,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靠大额举债来刺激完成的, 但其预设的前提是这一债务及利息的偿还者(即全体劳动者)要比所借来钱财的纯花费者(即退休者)的人数要多得多。但是, 这一情况到了 2033 年就会发生变化: 中国劳动力与老年人的比例就会降到 2:1,<sup>④</sup> 显然, 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 如何在政治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分配。从我国宪法的角度来看, 我们国家的公民享有充分的平等权利和自由, 但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不可能达到财富和收入的绝对公平。社会学家指出, 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一般分为积累性不平等和弥散性不平等。积累性的不平等更多地出现在农业社会, 但是“随着收入和大众消费的持续提高, 技术、识字、教育、富裕和大众传播也进一步扩散”, 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过渡, “他们成了较少积累性, 更为弥散性的了。”<sup>⑤</sup>

①[俄] 亚历山大·佐京:《刹车之路》,《生意人报》,2012 年 4 月 9 日, <http://www.gazeta.ru/>。

②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57 页。

③[俄] 亚历山大·佐京:《刹车之路》,《生意人报》,2012 年 4 月 9 日, <http://www.gazeta.ru/>。

④[俄] 亚历山大·佐京:《刹车之路》,《生意人报》,2012 年 4 月 9 日, <http://www.gazeta.ru/>。

⑤[美] 罗伯特·A. 达尔:《现代性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第 94-97 页。资源配置的积累性不平等是指各种不平等之间出现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政治体系中的每个人都根据其在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上占有的相对地位排列, 个人拥有的这种资源越多, 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如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没有相互关联), 资源的不平等就是弥散性的了。在弥散性不平等的社会中, 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



改革开放初,在体制转型的推动下政治资源不断扩散,农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公民有了自由经商的权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和可支配的资源。社会的各部分虽然拥有的政治资源的性质不同,但是都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谋求相应的利益,政治资源配置呈现出弥散性不平等。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弥散性不平等逐渐减弱,积累性不平等却日益强化。

当今,我国资源配置也出现“较少弥散性,更为积累性”的特征。更为积累性使得社会上拥有重要政治资源的个人或者阶层,拥有更多的其他资源,即“强者越强”。比如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个人或阶层比其他个人或者阶层更容易获得社会荣誉和尊重。较少弥散性,使得拥有其他资源的阶层或者个人,依靠自己拥有的资源获取社会上重要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即“弱者愈弱”。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为0.25,1992年突破了0.4的警戒线,2009年已经达到0.47。如果加上漏计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隐性收入,估计现在已大大超过0.5,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1%的财富。<sup>①</sup>

不患寡而患不均;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财富的问题缓解了许多矛盾。但同时,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问题的份量大大加重,在所有制结构上进行进一步改革,使贫富分化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

第三,在社会领域如何应对失业。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并逐渐波及到我国经济,相当数量出口导向企业、建筑企业、中小民营企业减产或倒闭。而农民工群体和应届大专院校学生占据了制造业就业的几乎半壁江山。在危机中,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现象。在金融危机下,拥有知识资源的现代大学生获得工作机会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因此应在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由“市场体制、服务政府和公民社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制,需要把就业优先放在政策目标的首位,把“反冲击”和“反周期”的目标有效结合起来。

总之,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强有力的支持,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带来了很好的契机。在应对风险中,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增强社会主义政府的调节能力,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才能增加社会主义凝聚力,才能长期坚守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国际共运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张 森〕

<sup>①</sup>刘国光:《中国财富走向》,《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11-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119页。